

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

针灸学在儒法思想的斗争中发展

李 仑

(上海中医学院)

针灸疗法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,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,是祖国医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春秋战国时期以来,法家思想对针灸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,儒家思想则起了消极的阻碍和破坏作用。二千多年来,针灸学就是在儒法思想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。当前,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,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,从针灸治病发展到针刺麻醉,这是针灸史上的一个飞跃。我们认真总结一下针灸学中的儒法斗争经验,对于深入分析针麻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,促进针灸和针麻的进一步发展,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
“人民,只有人民,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针灸也是出于人民群众的创造。人民群众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同时,发明了医药,发明了针灸疗法。儒家之徒,却硬说是“神农著《本草》”、“伏羲制九针”(皇甫谧:《帝王世纪》),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书《内经》,也挂上“黄帝”的名字。好象没有这些“上古圣人”,人民群众就不知道有医药和针灸。这是历史的颠倒。针灸是怎么来的?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并逐渐完善的。在石器时代,那时还没有金属的针,有了病痛就用砭石、骨针、竹针等作为医疗工具进行治疗,这是针刺疗法的起始;人类在应用柴火来烧熟食物和驱寒取暖的同时,就有可能采用艾火烧灼,以治疗虚寒的病症,这是艾灸疗法的起始。到了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,那时才制成了金属的针具。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,已经普遍使用铁器,医疗用具方面就有九种形式的针(“九针”)。《内经》这部书就是总结秦汉以前医疗经验而成。其中讲到:“砭石者亦从东方来”,“灸焫者亦从北方来”,“九针者亦从南方来”。(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)说明这些不同的疗法是来自各地群众的创造。很明显,针灸是起源于与自然作斗争的劳动人民的医疗实践,并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总结成医书。所谓“集众行事,愈者以为经书”,(《太平经·灸刺诀》)它决不是什么“生而神灵”的圣人坐在“明堂”里所能讨论得出来的。

相信上古的圣人,还是相信有实践经验的群众,儒家和法家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。儒家死抱着“今不如古”的观点,如汉代的儒家服虔,对砭石被金属针具所代替,也要哀叹一番,“季世无复佳石”,(《左传·襄二十三年》注)说现在处于末代,不能象上古那样有好石头,因而只好用铁针来代替。这种谬论,难免不被法家人物所嘲笑。如桑弘羊就说过,“信径疑今”的人,就象生了病放弃邻近医生不看,一定要等黄帝时的名医俞跗才看病。(见《盐铁论·申韩》)这话对于信古不信今、信圣不信民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批判。

针灸为劳动人民所创造,却被儒家之徒歪曲成出自圣人的恩赐。实际上,针灸的应用即是

对儒家教义的一种批判。儒家宣扬天命、尊崇圣王、主张礼治；针灸治疗则反对天命、藐视圣王、触犯礼教。韩非批评儒家：“用时日、事鬼神、信卜筮而好祭祀者，可亡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亡征》）儒家习用的这些鬼把戏，是针灸的发展的障碍，只有破除这些障碍，才能使针灸向前迈进。

—

针灸是在反“天命”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。

孔老二继承殷周奴隶主阶级“以神道设教”（《易经·观》）的传统，宣扬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有了病只需要向老天爷做祈祷，乞求消灾降福，而不要用针灸和药物进行治疗，反正死和不死都是听凭“天意”。奴隶主阶级既用“天命论”来麻痹劳动人民，想维护其反动统治；又用“天命论”来反对自然科学，反对用针灸和药物治病。孔老二对医药不感兴趣，对于巫祝却是十分敬重。当乡间的人在搞巫祝活动，他总要穿起礼服站在东边阶沿的主人位置上表示敬意（“乡人雉，朝服而立于阼阶”）（《论语·乡党》）。这一时期，是不是因为群众只知道用巫祝而不知道用针灸和药物治病呢？事实不是这样，早在孔老二以前，如秦国的医生叫医缓的，就已运用针灸和药物治病。（见《左传·成十年》）曾有人送孔老二药物，他连尝也不敢尝，这说明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反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，对于医药持反对的态度。

信巫还是信医，是春秋战国时期在医学领域里信天命和反天命斗争的具体内容。法家人物总是比较关心医学科学，注意群众的实践经验，并以其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促进医学的发展。当时，著名的民间医生扁鹊能综合运用针灸、药物治病，坚持与巫祝作斗争，认为“信巫不信医”是六不治之一。（见《史记·扁鹊·仓公列传》）指出巫祝治不了病，只能起欺骗病家的作用。对信巫不信医的人，扁鹊就很气愤。法家韩非常举扁鹊治病的例子作为推行“法治”主张的譬喻。说“法治”就象扁鹊用针灸治病一样，“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”；（《韩非子·安危》）儒家之流所说的骗人话，就象巫祝做祷告一样，是无益于治的。韩非说：“今巫祝之祝人……，而一日之寿无征（验）于人，此人所以简（轻视）巫祝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巫祝之被人轻视、趋于没落，是医、巫斗争的结果，也是法家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思想战胜儒家“畏天命”思想的结果。

当时，这两派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。扁鹊游历各国为人治病，后来到秦国的国都咸阳，给秦武王看病。这时正是秦国奴隶制复辟时期，秦武王听了保守派的意见，拒绝治疗，扁鹊气愤得“怒而投其石（针石）”。因扁鹊坚决反对天命、勇于实践，针灸医术高明，因而为保守势力所不容，终于被秦国太医李醯所暗杀。但他与巫祝作斗争的精神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。

《内经》一书，主要是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，也是医战胜巫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其中讲到“拘于鬼神者，不可与言至德；恶于针石者，不可言至巧。”（《素问·五藏别论》）反对鬼神致病的谬论，指出疾病的原因是由于一定的“邪气”，是“积微之所生”，（《灵枢·玉版》）有的疾病是因为“其所来者微，视之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故似鬼神”，（《灵枢·贼风》）并不是真正的鬼神作祟。《内经》中大约有一半的篇幅讨论针灸。认为人的生病好比是身体上某些部分有“刺”、有“污”、有“结”、有“闭”；这些病理现象都可以用针灸治疗，就好象拔刺、洗污、解结、通闭一样。对疾病说不可治是不对的，主要是没有得法（“言不可治者，未得其术也”。（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））这种坚持实践，变不治为可治的进步思想，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。这同孔老二在重病面前发出“亡之，命矣夫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的哀鸣是毫无共同之处的。

二

针灸是在反“不变”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。

西汉的董仲舒继承孔老二的衣钵,高唱“天不变、道亦不变”的论调,宣扬“天人合一”,胡说人的一切都符合天数,都是天命的规定。“身犹天也,数与之相参,故命与之相连也。”(《春秋繁露·人副天数》)说人体有三百六十六小骨节,是符合一年的日数;四肢十二大关节,是符合一年的月数等。这种天有什么人也有什么的“天人合一”谬论,目的就是叫人们听天由命,故步自封,不要去搞变革。以生搬硬套、牵强附会来代替科学研究。这种谬论影响到针灸,就产生经络穴位有定数、针灸方法和治疗配穴都有定数等说法。还将这种“法”和“数”说成是“圣人之言”。“圣人之言”即是“定理”,不许人们有任何的突破。但历史上不少进步的针灸家,尊重医学发展的规律,注意总结群众的经验,因而能冲破古人立“法”定“数”的局限,做到有所创造、有所前进。如明代针灸家杨继洲说:“治法因乎人,不因乎数;变通随乎症,不随乎法。”他着眼于“人”,着眼于“症”,不受“数”和“法”的限制。他还认为,经络穴位的增多,针灸治法的增多,并不是“故为此纷纷”,有意造成混乱,而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因为“民之受疾不同,故所施之术或异,而要之非得已也,势也。势之所趋,虽圣人亦不能为之所也已。”(《针灸大成》,卷三)他指出这种事物发展的趋势是任何人不能加以阻止的。

事实正是如此。属于一定经络的穴位(经穴),《内经》中记载其穴名约为160个;后来《明堂孔穴》一书,记载349个;宋代的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,记载354个;近代针灸书,记载361个。除了“经穴”之外,还有大量的“经外奇穴”。经外奇穴,多数又是从疾病的“压痛点”(阿是穴)发展而来。穴位逐步增多,正是出于群众在医疗实践中有所发现,是群众的创造。唐朝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中就有关于“阿是穴”来源的记载。说江南(吴)和四川(蜀)等地群众喜用灸法,凡是有了病痛就在身上找酸胀明显的“压痛点”,病人当按压到这一敏感部位时,一般会“阿”的一声,因此叫做“阿是”穴。在“阿是”穴上针灸,都有很好疗效。(见《千金要方·针灸上》,灸例)这很具体地说明,“阿是”穴的应用是出于吴、蜀等地群众的创造。

三国时的名医华佗,在针灸方面也有许多创新,他的用穴就不为原有的“经穴”所限。著名的“华佗夹脊”穴,为近代临床所常用,这是华佗根据实践经验,将古代相传的背部五脏六腑“俞穴”,由原来距离脊椎正中一寸五分缩减为距离正中五分。这样紧靠脊椎取穴较为安全,便于深刺,有较好的疗效。华佗的学生樊阿继承了华佗的经验,就善于用深刺。(见《三国志·华佗传》)这对于古代规定的针刺深度是一个大胆的突破。从这一事例说明,经络穴位是可变的,针灸的方法也是可变的,有变才能有发展。

但是,一些儒家之徒,总是力图以不变论来限制针灸的发展。胡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,人身只能有三百六十五穴。对于针灸配穴,也接受孔老二“上律天时”的说教加以神秘化和刻板化。自董仲舒大肆鼓吹“天人合一”的谬论之后,到宋代的邵雍达到了极点。流毒所及,使针灸方面出现了所谓“子午流注”配穴、“灵龟八法”配穴等法。将属于儒家谶纬神学的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等神秘主义的东西,都拉扯到针灸理论和方法中来。甚至不根据病人和症候的特点,片面强调按“时”用穴。但是,尊重实践、坚持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的针灸家,一方面受了宋、明时期王安石、张居正等变法思想的影响,就反对这种“以不变应万变”的形而上学观点。如明代针灸家杨继洲等人,强调“病以人殊,治以疾异”;(《针灸大成》,卷三)对于按时用穴的一些怪论被排

斥为“后世术家之言”，“何足信哉”！（高武：《针灸聚英》附辨）这样就使针灸学能沿着祖国医学“辨证施治”的正确途径继续前进。

三

针灸是在反“礼”的斗争中向前发展的。

孔老二鼓吹“克己复礼，为仁”，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退。“仁”是“礼”的核心，而“孝”又是“德之本”、“仁之本”。要贯彻“礼”的反动政治路线就必须提倡孝道。所以历史上一些反动统治阶级在强调“礼治”的同时，还宣称“以孝治天下”。儒家的《孝经》中有说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按照这条孝道，身体上连头发、皮肤都不能有些损伤，那还怎能谈得上针灸和外科手术，怎能谈得上死后的解剖。针灸的应用，是直接对儒家“仁”、“孝”、“礼”的挑战。针灸治疗要刺破皮肉、烫伤肌肤；《内经》还说过，经络穴位在活人身上可以通过推按体表来寻找感应，死后可以“解剖而视之”。（《灵枢·经水》）针灸的基础理论——经络学说，就是古人根据医疗实践经验，并结合一定的解剖知识总结而成。我国古代不少进步的医家，敢于冲破“仁”、“孝”等孔孟之道的束缚，进行了人体解剖，推进针灸的发展。例如，宋代一个不出名的针灸医生张济，他得到民间“异人”的指导，“能亲解人而视其筋、络，则无不精”。后来张济趁饥荒、瘟疫死人多的时候，前后一共观察了 170 具尸体。由于熟悉了人体的结构，他的针灸术大为提高。（见张杲：《医说》）

儒家以孝道来反对针灸，又以划分“有大人之事、有小人之事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）的“礼”来贬低针灸。宣扬反动理学的朱熹说过：“农、圃、医、卜之属”都是“小道”，（《论语·子张》注）针灸一行又被儒家之徒看成是“小道”中的“小道”，如一些“儒医”就自认为“大方脉”、“大内科”，看不起针灸。本来针灸疗法是来自劳动人民，面向劳动人民。如《内经》讲针灸主要是从劳动人民的角度立论，说“此皆布衣匹夫之事”，指明与“王公大人、血食之君”（《灵枢·根结》）的要求是不同的。反动统治阶级由于养尊处优、怕痛怕痒，总是歧视针灸、反对针灸。具有法家思想的人则不是这样，他们讲究功利、比较尊重客观事实，能注意到针灸的实效。例如唐朝的武则天，初时对针灸医生要给唐高宗治头痛，表示反对，后来见到疗效则大加赞赏。（见胡璩：《谭宾录》）在皇帝头上针刺是件非同小可的事，统治阶级对此终究不放心。一直到了清朝道光二年（公元 1822 年），日趋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就命令撤销太医院的针灸科。理由是“针刺、火灸，究非奉君之所宜”。这样，太医院针灸一科就“永远停止”。针灸为反动统治阶级所不容，在民间仍然受到劳动人民的珍视。此后，仍然有人编写出版普及性的针灸书籍，如《针灸易学》等。太平天国的军队里也是广泛使用针灸，而且实行脱开衣服、显露穴位扎针，反对隔衣针刺。这种卫生措施，反动统治阶级却污蔑他们不分男女都露体针灸，是伤风败俗。以上事实说明，反动统治阶级以儒家的“仁”、“孝”、“礼”来奴役人民，扼杀针灸，而广大劳动人民就敢于蔑视儒家的“礼制”，推行针灸疗法，使针灸学能继续流传和发展。

近代，一些尊孔的反动派，一面以儒家的“礼”压迫人民，屠杀人民；一面又本着儒家的“礼”向帝国主义进行卑躬屈膝，推行尊孔与崇洋相结合的卖国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。汉奸、刽子手曾国藩就是这方面的鼻祖。他借了帝国主义的洋枪队攻打太平军，同时还竭力贬低祖国医学。他对司马迁《史记》为医家扁鹊立传感到大为恼火，说：对“小道”何必那么重视，讲得那么多干什么？（“繁称奚为者？”）从曾国藩、蒋介石、刘少奇到林彪都是这种尊孔与崇洋相结合的卖国

贼。蒋介石于1929年,竟然通过洋奴余云岫关于“废除旧医”的荒谬提案;刘少奇还宣称“在不久的将来,西医药必然要代替中医药”;林彪同样也在高喊“欧洲权威”。他们前后串连一气,共同拜倒在帝国主义的脚下。

四

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祖国医学遗产,早在1928年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一文中就指出了“用中西两法治疗”的方针。毛主席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一文中批判“所谓‘全盘西化’的主张,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。”全国解放后,毛主席为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题词,发出了“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,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,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”的伟大号召。1958年,毛主席又发出了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,应当努力发掘,加以提高”的光辉指示,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否定中医、消灭中医的卖国投降路线。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,大搞西医学习中医、中西医结合的群众运动,针灸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。不少地区的革命医务人员进一步发扬敢想、敢说、敢做的革命精神,在广泛开展针灸治病的基础上,创用针刺麻醉,即以针刺穴位的方法代替药物麻醉用于外科手术。针麻的成功是麻醉史上的一个创举。“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。”如何对待针刺麻醉这样一个新生事物,这里充满了两条路线斗争。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下,一些尊孔崇洋之徒,对针麻进行百般刁难,攻击针麻“不科学”、“无实用价值”,由于这种干扰,针麻得不到应有的推广,而且不少已经开展这项工作的单位,也纷纷被迫下马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,摧垮了刘少奇、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,随着革命的洪流,针麻工作排除民族虚无主义等各种障碍,奔腾向前。目前,据不完全统计,全国已积累了一百多万例针麻手术病例;适应手术范围也不断扩大,从扁桃腺截除等小手术到体外循环心内直视等大手术,相继应用针麻,并获得成功。广大工农兵和针麻研究工作者对针麻理论原理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,出现了一派蓬勃的景象。

针麻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,是针灸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继续。孔老二曾宣称“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”,妄图以此来吓唬劳动人民,阻挠革命。但革命的人民是不怕这一套的。我国古代人民,接受法家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,坚持实践,勇于创新,在不畏“天命”、不畏“大人”、不畏“圣人之言”的斗争中推动了针灸的发展。今天,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,更以大无畏的精神,战胜刘少奇、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,在针灸治病的基础上创造了针刺麻醉。这是针灸学的一个飞跃。“路线是个纲,纲举目张。”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,科学技术就能得到迅速的发展,针灸学也能得到迅速的发展。我们必须加强对马列主义、毛主席著作的学习,树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,吸取针灸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经验,联系群众,联系实际,深入批林批孔,进一步肃清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,使针灸和针麻工作能更好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。中西医团结起来,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,为创立和发展我国统一的新医学作出贡献。